

渡南洋·化众生——南来僧俗与槟城世俗教育的发展

陈秋平

南方大学学院通识教育中心

内容摘要：

汉传佛教作为马来西亚佛教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其拓展的过程中，积极的产于到世俗教育的发展，得到了非凡的回响。僧俗二众“渡南洋”后，从创设义学非正规教育开始，进而开办幼儿园、菩提小学和菩提中学，除了让华人获得教育机会，亦对弘扬佛法起得良好的效果。佛教界无论是为世俗教育目的，还是为了弘扬佛法，都为发挥佛教慈悲度众的精神。

长期推广世俗教育，让佛教在度众方面，成效非凡。在社会文化方面，通过教育调和贫富差距和建设道德文明；因对世俗教育的贡献，树立了佛教的形象；结合教育机构以达弘扬佛教的目的，改变了马来亚华人社会普遍上佛道不分，进一步了解正信佛教；推广华文教育以延续汉传佛教的前程等方面，都有不错的表现。

关键词：

汉传佛教、世俗教育、义学、菩提学校、渡南洋

前言

汉传佛教作为马来西亚佛教的组成部分，在整体大马佛教发展中的角色是不可磨灭的。自马六甲王朝后，佛教在马来亚进入缓慢期，只有南传佛教在马来半岛北部流传，佛教在其他地方几乎灭迹了。而在英国殖民时期，由于大力发展而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不得不从印度、中国、锡兰和缅甸等地引入苦力。不同传统的佛教也随着这些移民而再次传入马来亚，让佛教在马来亚再次展现强大的生命力，并逐渐发展成马来西亚的多元佛教特色。

汉传佛教作为最大佛教群体，其对马来亚佛教发展的影响也是最大。从移民带入佛教开始，直到后来所展开的推广正信佛教，破除对佛教的误解，汉传佛教僧俗二众都付出无限的精力和财力，成就了今天的马来西亚佛教发展。

本文将集中探讨槟城佛教界所从事的世俗教育工作，厘清南来的汉传佛教僧人和居士，对马来亚世俗教育的贡献，说明如何通过世俗教育，贡献于社会及发展佛教。通过文章的内容，也可以清楚的看出中国现代佛教如何流传海外，并获得巨大的发展，从而了解中国现代佛教对海外社会的贡献。

一、渡南洋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因殖民主义的剥削经济利益，马来亚进入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期。经济的发展意味

着对人力资源需求的增加，当时的中国、印度、锡兰等国家却面临着政治、经济、社会等问题。这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拉力”与“推力”，促使许多的劳工移民被引进马来亚，并长久定居。

华人南移的内在动因乃因中国内政不稳，农村经济崩溃以及有利的出洋条件等。清朝末叶，时有战乱。尤其华南地区，除了内忧，还得面对外患。各种抗争、战乱、军阀榨取以及革命，加上西方列强及日本的侵略，造成民不聊生。¹

清朝政府颁布的“迁界令”及海禁，进一步使得沿海一带荒芜，经济衰退。而1700年至1850年期间，中国的人口快速的增加达致3倍以上，可耕地却严重缺乏，造成粮食不足和通货膨胀。频繁的天灾人祸，随之而来的便是更多样的赋税，加重人民的苛捐杂税。最终，19世纪中叶时，预计有60%至90%的农夫失去田地。

太平盛世已不在，加强了居民往外移居的动力。为了远离长久的困苦的生活环境，处于南中国海南端的马来亚，便成为他们的希望之一。加上中国东南沿海各地方海岸线袤长，虽有海禁，但并非地方兵官所能完全防守的。地方官员也基于同情之心，闻而不问，与其让贫民饿毙本乡，不如让他们冒险犯难，或者还有一线的生机。²

1860年10月10日，签订的中英北京条约（中英续增条约9款），其中第5款规定：

戊午年定约（1858年天津条约）互换以后，大清大皇帝允于即日降谕各省督抚大吏，以凡有华民情甘出口，或在英国所属各处，

¹ 陈支平：《福建宗教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第228页。

² 张奕善：《东南亚史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第299页。

或在外洋别地承工，俱准与英国立约为凭，无论单身或愿携带家属，一并赴通商各口下英国船只，毫无禁阻……………”。¹

清朝首次认可人民渡航海外的自由。²于是全中国人民皆可自由出国工作，意味着有更多的人移居海外。

1877年，新加坡设立清朝在东南亚的第一个领事馆，之后又于1893年在槟城设置隶属于新加坡总领事之下的副领事一职，说明清朝政府渐关注东南亚华人。张之洞也向清政府提出保护华侨免受欺凌，他认为假若任由华侨面对迫害，最终极有可能选择返回中国。假使这百万华侨返回中国，必将加深中国的人口过剩问题。³而且每一年，从海外侨民汇入中国的金钱，可弥补中国国内因贸易逆差而造成的亏损。驻英公使薛福成甚至认为因为不断有海外侨民汇钱回乡，进一步造成沿海各地人民生活好转。⁴

自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因为得到海外侨民的协助，国民政府对于海外移民采取护侨的措施，这对于中国人移居马来亚有着极大的鼓励作用。而且此时英国殖民政府也颁布了保护劳工法令，此行动对于中国人移居马来亚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其实华人除了直接移民自中国，还有少部分的华人来自泰国和缅甸。无论如何，来自泰国和缅甸的华人为

¹ 王云五：《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第12页。

² 杨建成：《华侨史》，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十六集，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5，第94页。

³ 王树枏编：《张文襄公（之洞）全集》，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卷23，第8-15页。引自吴剑雄：《海外移民与华人社会》，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第36-37页。

⁴ 薛福成：《薛福成全集·海外文编》，卷1，第17-18页。引自吴剑雄：《海外移民与华人社会》，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第38页。

数极少，他们大都是第二或第三代泰国和缅甸华人，因某些因缘而再次移民马来亚。这些移民大多集中在马来亚北部的檳城。¹

以上种种原因，促使马来亚华侨人口不断增加，1921年为855,863，10年后增加至1,284,888，到了1941年，华人人口达到了1,884,534人。

有些僧人随着老百姓而来，早期南来的“仪轨法师”和“化缘”法师就是大陆僧侣落脚于马来亚的雏形。僧人南来，除了以上的避难原因，也为了满足华侨的宗教需求。初期南来的僧人主要是从事佛教经忏、超度法事为职业的“仪轨法师”。²他们虽然也“住持”一些寺院或庙宇，但主要工作是协助民众进行各种宗教仪式，如开光、丧葬超度、消灾延寿等法事。因此，虽然扮演着宗教师的角色，但却没有佛教僧侣的实质内涵。

19世纪80年代，广福宫开始有住持和尚一位，和属下僧人以每年缴交\$2000.00“香烛馮”，³且限住12位僧人，分两班，共同承包香火，并且为人建醮打斋，保运礼斗。实际上，这些僧侣的社会地位极低，不仅不比一般秘密会社帮众超然脱俗，还处处面临着会被革出

¹ 几乎所有有关华人移民的著作都没有提到任何移民自泰国和缅甸的华人，其中的原因当然就是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了。但在笔者的研究中，来自这两个国家的华人却是非常重要的。泰国与缅甸属佛教国家，虽然华人所信仰的佛教乃属于中国佛教，但比来自中国的移民，他们对佛教的信仰要虔诚的多了，因而他们对佛教的发展也扮演着一定的角色。据了解，泰国和缅甸华人之所以再移居马来亚，部分原因是为了到马来亚接受华文教育。

（2000年9月11日和2000年12月13日于菩提学院分别访问谢达婉老师和庄素和居士）。

² “仪轨法师”及后文的“传法法师”的用词，参考自许源泰：《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3，第119页。

³ 可被看待成标金。

或遭受体罚的制裁，正如广福宫的规条中，就有规范僧侣行为的条款，也有说明如何处罚犯错僧侣的条约。¹

虽然当时的佛教相对松散，缺乏制度，更像“民间信仰”或“民间佛教”体系，并不具备传统佛教的讲经说法，更遑说修行成道的观念。但是，他们却能满足华侨的心灵和世俗需求，因而，虽缺制度化而松散，却也能感召以华侨为主的信众，产生一股绵绵不绝的生命力。而正是这股生命力，让后来的“传法法师”有其群众基础，展开度化众生的使命。

许源泰在分析新加坡佛教时说：

早期的佛教僧侣从大陆南来时，由于出家性质，皆主动到各大小庙宇挂单，即使是民间信仰神庙，佛教僧侣都愿意出任为住持或知客僧等。因此，前来庙宇上香祈福之善男信女、社会名流或富商夫人等，均只认识僧侣，甚少留意道士。一旦家中有任何红白法事需要宗教仪式专家处理，自然会联想到佛教僧侣，而非道坛道士。”²

这一段文字，放到马来亚也一样适用。无论如何，此期南来的僧侣，并没有长期定居马来亚之打算。这些“仪轨法师”，除了让民众对佛教“僧宝”有点印象，对马来亚汉传佛教的发展也没有显著的贡献。

至于“化缘”法师，是由于受战乱摧毁，或是年久失修，他们在中国的寺院破旧不堪，寺院本身无经济能

¹ 更多有关香烛馐和及承包一方与寺庙信理之间的条约的文献资料，可参阅开谛：《南游云水情：佛教大德弘化星马记事（附录篇）》上册，槟城：宝誉堂教育推广中心出版，2017，第23-25页。

² 许源泰：《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3，第90页。

力修复，加上民众生活困苦无法捐助，唯有向海外华侨募捐。因此，僧人云游至马来亚，向当地的华侨化缘。有某些在马来亚做长期定居，其中福州鼓山涌泉寺的妙莲法师便是其中一位，他的到来，为马来亚开启了“正信”之路。

殖民政府于 1887 年委任 20 名华社领袖、商绅为广福宫董事，他们包括了胡泰兴（局绅，Justice of the Peace，即 JP）、许武安（住在槟城的霹雳州州议员）、邱天德（邱公司主席）、谢德顺（槟城第一座五层楼大厦的拥有人）及许森美。他们被主要负责槟城广福宫庙务，以及甄选适当的住持和尚，以解决广福宫僧人受民众争议的问题。他们最终礼聘从福州鼓山涌泉寺南来槟城化缘筹建法堂的妙莲法师，驻锡成为住持和尚。不幸由于会党政治的涉入，这次的委任事件却使平章公馆内部发生歧见，及在殖民地政府内引起阵阵波澜，最终导致妙莲法师离开广福宫。¹

其实妙莲法师离开广福宫还有其他原因，一说妙莲法师认为广福宫地处闹市，不便静修，想另觅幽静之处以避嚣尘。同时法师也为槟城佛教的迅速发展感到忧心，虽然在量上不断增加，但佛教徒的素质却让人担心。槟城汉传系佛教缺乏有素质的出家人领导佛教的发展，因此法师决心创寺，带领华裔佛教徒进一步了解中国大乘佛教的传统与真义。²

有如此觅地栖禅之意后，法师开始策杖寻幽，逐在槟城亚依淡（Air Hitam）发现一座适用的山地，极乐寺志如此形容此山：“…最高一峰，崑然秀出，左右支

¹ 陈剑虹：《槟榔屿广福宫史话》，《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 188 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特刊》，陈剑虹主编，槟城：广福宫信理部，1989，第 34-36 页。Wong Choon-San (1963). “Kek Lok Si”: Temple of Paradise.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Ltd. pp 9-10.

² 竺摩法师：《荡执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第 227 页。

脉为青龙、白象，两岗若拱，卫焉据形，家言峰如白鹤展翅，宜建梵刹，故以为名”。¹觅得适合建寺的山脉并得到鼓山祖寺的许可，后又于 1891 年获得来自闽南的杨秀苗答应将其于半山腰，²占地 10 英亩的别墅出让，并于 1893 年 9 月正式完成割让土地拥有权。³但在手续完成前，即 1891 年，妙莲法师已开始建观音大士殿，为别于市内之广福宫亦名观音亭，就起名“新观音”。后来觉得每登鹤山，俗尘皆涤，心意快然，就易名极乐寺。又因其山状似白鹤展翅，意欲凌霄，即名之为鹤山。⁴同时在得如法师、本忠法师和善庆法师等的协助下，开始为创寺计划募化基金。

其实南来僧人并不一定愿意定居马来亚，他们心系祖籍地，尤其是祖庭的事务。所以这些僧人在早期都两地奔波，且很多部分的捐款都汇回祖居地。但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地完全断交，回国之意愿断绝，唯有定居马来西亚。从旅居到定居的转变，也是马来亚汉传佛教发展的转折点。而极乐寺的创立，标志了南来僧人为传统汉传佛教开启了“知识佛教”的进程，为马来亚僧俗教育奠定了基石。⁵

¹ 释宝慈：《极乐寺志》，槟城：极乐寺，1923，第 59 页。

² 杨秀苗为槟城公共工程局（Public Works Department）财物部的退休职员，他曾经到过福州鼓山看过那边的佛教寺院。

³ 根据槟城土地注册局的纪录，引自 Wong Choon-San(1963). “Kek Lok Si”: *Temple of Paradise*.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Ltd. p11.

⁴ 竺摩法师：《荡执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第 228 页。

⁵ 继程法师解释“知识佛教”时如此阐明：“‘知识佛教’是我在了解马来西亚近期佛教的发展时所安立的一个词汇，与“仰信佛教”、“学术佛教”、“哲理佛教”等等词汇做分别，是指佛教发展的某一阶段，或学佛的某一层次。知识佛教是指佛教徒从仰信式的层次或阶段提高到他们接受佛教时，并不停留在佛教仪式或经忏法会的需要，而已着重对教理的研究与修学。但其研究程度尚未达到学术水平，思想的提高也未有哲理的意境，修持方面亦未触及较高深专门的领域。这一层次的学佛程度应是普遍的，对大多数佛教徒而言，不停留在仰信形态的佛教而踏入知识佛教的层次，就是在学佛

二、化众生

本节将从宏观的华文教育角度，说明南来僧俗对马来西亚佛教与社会的贡献。佛教界从事的世俗教育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为直接参与教育工作，如创办义学和中小学，二则为间接贡献于教育发展，如成为独中、小学，国中董事。

义学和正规教育是佛教界最早从事的世俗教育工作。之所以参与到教育的行列，主要为发挥佛教的慈悲度众精神，让失学孩童获得教育机会，另一方面也能让社会改观对佛教的错误观念。更重要的是借助世俗教育之管道，弘扬佛法。

（一）、 义学

最早的社会教育是极乐寺在山脚下所办的义学，此义学以失学青少年为对象，为家庭困难的贫民子弟提供义务教学。当时华人社会经济能力薄弱，教育也不发达，极乐寺义学的成立，实是恰到好处，为当地青少年提供学习机会。

极乐寺寺产极其丰富，“或从钵余所购或由募化而得，皆属园坵”，园坵有数区，大多坐落于后山，其收入主要使用于维持香积。由于累积了不少的资产，且为

生命的提升上，打下重要的基础。从此基础，再往上提升，便可走向学术研究，哲学思想或专精修持等方面了，因此可以说是学习佛法重要的阶段。”（继程法师：《印顺导师与马来西亚佛教》，《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 25 周年特刊》，槟城：马佛青总会，1995，第 105 页。）

了管理上的方便，便成立寺产管理委员会，妥善管理寺产。庞大的资产，有利于义学的创设。

1913年，本忠和善庆和尚，目睹基督宗教学堂的成功，欲学习兴建学堂办学，以期培养学子，阐扬教旨。他们不单付诸于行动，更曾回闽聘请师范附属中学校教员林某君，南来担任校长一职。根据1913年4月29日的槟城新报，义学开课时，

附近山下之子弟上学者，已有五十余名，现在暂借寺内斋堂为教习所，惟略嫌迫狭，刻两大禅师拟就大士殿外，旁边空地，另建校舍一所，庶可广容多数学生，大约不日即可兴工云，似此慈善为怀，栽培寒素子弟，将来人才辈出，两大禅师之功德，诚非浅渺也，故乐表而出之，以为人心办学者劝。¹

从以上文字得知义学得到了附近居民的欢迎，也能理解极乐寺办义学的宗旨。

据极乐寺志，善庆法师在泰国洞里请得数千亩的土地大事开垦，²并成立“佛教实业公司”，希望将所获得之收入，在海内外办医院、学校、育婴堂等。但法师

¹ 《槟城新报》，1913年4月29日。

² 善庆法师号海泉，俗姓官，父亲名先瑞，母亲姓夏，乃闽南之建瓯人。1890年出家于鼓山，礼禅德和尚为师，次年礼妙莲法师受具足戒。后南来槟城协助妙莲法师创建极乐寺，并托钵四方募金为助，除了督促禅堂、方丈室等工程，也担任极乐寺的监院。（更多善庆法师与佛教事业公司资料，请参阅释宝慈：《极乐寺志》，槟城：极乐寺，1923，第50-55、107-109页）。对于泰国洞里的土地，虚云和尚年谱中却说明此地乃泰国国王送给虚云和尚的，大约有三百顷之大，后由虚云和尚转送予极乐寺善庆法师，并在此设树胶厂（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佛光大藏经 --- 禅藏·语录部 --- 虚云和尚年谱》，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第83页）。

的计划却因欧战顿起，世局骤便，使法师的大计顿然破灭，连义学也连带受到影响。

1935年1月18日，槟榔屿佛经流通处附设中华义学在槟城新报刊登招生广告，又于同年1月22日发布一则相关新闻。流通处为笃信佛教同仁所创，佛学顾问为极乐寺方丈本忠和尚。除了流通佛经，也附设义学。义学因学子日增，校舍不足容纳学生，因而议决扩充义学，并成立女子部，免收学费，以利济平民教育。招生广告中，列明报名处为光华日报、中国领事馆和槟城新报，这足见当时佛教界对于创设学校的重视，而与媒体合作，达到广招学生的目的。另，从领事馆作为报名处之一，也显见中国政府对于海外华侨教育之重视。¹

两所义学停办之后，就不再有义学的创办。虽然义学已停办多时，但佛教界仍肯定教育的重要性，认为有必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并付诸行动以推动佛教的传播，改变社会对佛教的误解。加深社会对宗教理性了解的同时，也能为佛教培育人才。

妙香林广余法师和广义法师二人基于这样的认识，认为弘法不离教育。因此于1963年倡议兴办佛教夜学，经筹备委员会多次的座谈与会议商讨，着手拟定计划书，广邀文教界人士组成咨询委员会，并推选佛教界暨热心公益人士为董事。1963年11月11日开始招生后，便有一千余名失学或辍学之清贫子弟报名，参加1963年12月1日假槟华女子中学举行的入学考试，经考试评定，录取了六百多位学生。1964年1月20日“槟城佛教义学”正式成立并开课。为学生提供免学费教育之外，还免费供应课本及讲义。该校本着“觉己觉人，立人立

¹ 此处报章报道资料转引自开谛：《南游云水情：佛教大德弘化星马记事（附录篇）》上册。槟城：宝誉堂教育推广中心，2017，第290和293页。更多有关极乐寺义学及槟榔屿佛经流通处附设中华义学的文献资料，也可参阅此书，第289-294页。

己”的宗旨，一开始便开设 12 班，一方面从事技术教育之训练，传授生活技能，另一方面着重道德之修养，弘扬佛陀慈音，以期在技术教育及人格教育两方面培育学生。全校编为低级、中级、高级及特别班 4 组，每组修业 2 年，每周上课 5 晚，每晚 3 节。研读科目计有中、英、巫三种语文、簿记、珠算、打字、商算、公民、应用文等。作为佛教界所成立的义学，校方也特别增设佛学一科，使学生明了“学佛须从做人起”，能受用佛法，即可培养健全之人格，积极向善为社会人群服务。教员方面也具有高素质，共有义务教员 25 位，其中具有大学毕业资格者占三分之一。¹

学生们一般已在社会就业，开办以来，有工作者占大多数，如在 1969 年，70% 的学生为在职生。他们利用工余时间在晚间上课，属于辅助教育性质，所以所授之功课，都以实用科目为主，以期对工作有所助益。有些则是原本受英文教育之华人，希望在义学学习母语，因而也特别开办华文母语班。

校方延也聘请专才负责督导学生活动，先后成立了佛学研究会、美术研究会、象棋研究会、合唱团、健美会、武术团等。让学生在课余时，组织学会，通过课外活动，扩大知识面，开拓视野，促进智力的发展。更希望通过开展多样、生动、有趣的课外活动，有利于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在课外活动这块广阔天地里进行探索、锻炼。其中，佛学研究会配合佛学课，希望学生在智育和德育两方面都得到重视，培养完善人格。²

¹ 骆静山：《槟城佛教义学简介》，《无尽灯》第 43 期，槟城：马来西亚佛教总会，1969，第 24 页。

²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辍学之情况已有改善。因此今天的佛教义学也改变了形式，许多在学校可以学到的课程已被取消，如今的课程多为语文和文艺类课程。

如今，随着社会、经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辍学之情况已有改善。因此今天的佛教义学也改变了形式，正规学校能学到的课程已被取消，目前以语文和文艺类课程为主。

学习必须从小孩开始，在照顾成年人教育的同时，也应重视幼儿教育。虽已有不少私立幼稚园的成立，但基于经济能力，大多数家长并无能力把孩子送入私立幼稚园。可是因缘仍不足，在未有能力开办正规幼稚园前，折中的方式便是开办星期日免费幼稚园。

考量到星期日为休业日，家长有空闲护送其子女入学，实有方便之处。因此马来亚佛教会教育组议决开办星期日幼稚园。为慎重起见，先于1965年9月初至11月下旬试办三个月课程，有百余位学童参加，这一次的试办获得家长的好评，增强了开办幼稚园的信心。经教育局批准注册后，1966年1月在菩提学院正式开办“马来亚佛教会星期日幼稚义学园”，第一期学生有200余人，分5班上课。课程主要以看图说话、认字、故事、图画、恩物玩具、唱游等。¹

为让更多学童有机会接受学前教育，幼稚义学园不收学费，且为教学之方便，分赠糖果纸笔等用具，家长不须负担费用。凡5岁至6岁未入正式幼稚园之儿童，均可享受学前教育机会。

其实，当整体社会对佛教缺乏好感时，佛教界努力为社会提供就学的管道，必能让社会改观，对佛教的发展绝对有利。同时，通过非正规的教育，也能通过宗教氛围不太浓厚的世俗义学，在教导世俗知识的同时，灌输简单的佛教思想，不失为有效的传播佛教之管道。

无论如何，唯有系统完整，专业的正规佛教教育，通过系统的内容，从浅而深，才能发挥佛教教育的功能，

¹ 陈少英：《马来亚佛教会设立星期日幼稚义学园概况》，《无尽灯》第39期，槟城：马来西亚佛教总会，1968年。

培养出有素质的学生，为整体社会和佛教的发展扮演角色。

（二）、华文教育

华人一向重视教育，当社会经济稳定后，最早给予重视的便是教育。从早期的私塾教育到后来的新式教育，华人社会都投入了极大的人力和财力。1930年代后，佛教界也开始创设正规世俗教育。

学前教育方面，如前所述，佛教界于1965年创办星期日免费幼稚园，最终于1970年，开办“马来亚佛教会槟州正化幼稚园”。

至于中小学教育，则始于菩提学院。菩提学院成立于1935年农历2月初5日，开山住持为芳莲尼师，是槟城唯一的女众道场。¹芳莲尼师在原址创立菩提学院，创立初时的宗旨是：（一）、阐扬佛法、（二）、收容孤儿和（三）、设立佛化教育。²

¹ 芳莲尼师系福建厦门人，16岁时从道阶法师出家学法。1930年南来宣教，虽然只住茅篷，但还是在自修及弘化方面做出极多的建树，深得华侨的崇敬。由于没有道场做为永久的宣教场地，因此信徒林碧佑、邱爱莲、林桂仙、叶彩秀、侯秀云和林桂玉等，发起募购圆岛头园屋，后重新修葺，将原本三间房屋的其中一建改为佛殿，另两间却修建为修士宿舍和厨房及食堂。成立菩提学院后，芳莲尼师亲自出任住持，除了亲自宣讲佛法，还恭请道阶、慈航二位法师莅院开示佛法。但芳莲尼师掌院的时期并不长，由于过劳成疾，于1937年农历7月23日示寂，世寿才36岁。根据立于菩提学院的芳莲尼师纪念塔。其实根据目前还居住在菩提学院的菩提学校前任老师谢达婉居士的告知，芳莲尼师发心前来槟城宏扬佛法时已抱病在身，后加上为菩提学院事务忙碌，过劳加重了病情，才会在壮年时便已圆寂。

（2000年9月11日与菩提学院拜访谢达婉老师。王弄书：《菩提学院之始创及办学因缘》，《纪念王弄书居士辞世周年特刊》，特刊编者主编，槟城：菩提学院，1965，第6页。）

² 陈英：《槟城菩提学院成立四十五周年报告》，槟城：菩提学院，1980，第3页。

芳莲尼师圆寂后，学院的管理交由大众，直至翌年（1938年）才由芳莲尼师的徒弟陈宽宗继任住持，并由吴宽定任副住持¹，尚有陈慈华等协助。

借助菩提学院的成立，及为达致创院宗旨，她们创办了全槟岛唯一由佛教界所开办的小学 and 中学，即菩提小学和中学。菩提学院创学过程，初以义学发軔，继以小学奠基并停办义学，发展而至中学。

创办义学，除了要履行芳莲尼师未了的心愿，也为让华人有学习中文之处，而社会无数贫寒失学儿童，更需要给予辅导入学。因此在陈宽宗任住持期间，菩提学院请来了于1938年离开仰光到槟城福建女校（即现在之槟华中学），任师范部国文老师的王弄书居士协助创设义学，²并邀得毕俊辉、陈少英、吴人俊、吴南英、何慈灯、陈淑勉等，义务担任教师与行政工作。³王弄书居士以她在缅甸及新加坡的办学经验，协助于1940年成立义学，以利失学儿童。不出数月，学生人数已达80余人。可惜一切在日军入侵时而改变！由于日军入侵后，华人四处躲避日军的迫害，因此学生无法到学校上课，义校也随之停办。

¹ 陈宽宗来自印度尼西亚，60岁时礼演本法师剃度为尼，法号慧持，并礼请志昆和尚与竺摩法师合为三师，传授比丘尼戒。后因劳成病，于1957年农历9月20日午时，微笑合掌西归，世寿62岁。吴宽定后也出家，法号继莲。她与芳莲尼师一起从中国到槟城来，在中国时便开始追随芳莲尼师（谢达婉老师所供资料，陈英：《槟成菩提学院成立四十五周年报告》，槟城：菩提学院，1980，第4页。）。

²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第193-199页。更多有关王弄书居士的事迹，可参阅《纪念王弄书居士辞世周年特刊》，槟城：菩提学院，1965，及陈秋平：《慈悲为怀扶贫弱·兴学弘教传薪火——马来西亚菩提中学创办人王弄书》，《中教学报》，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2014年8月，第39期，第66-69页。

³ 陈英：《槟成菩提学院成立四十五周年报告》，槟城：菩提学院，1980，第4页。

日军撤退后，演本法师敦促应迅速复办义学。院方迅速召开会议，议决推选陈少英、吴人俊和陈德行负责复办义学。复办义学的同时，也开始计划筹办菩提小学，并敦请护法及侨界领袖召开赞助人会议，会议即席选出了董事会。首任董事长为苏承球，副董事长为潘应祥，财政则由许平等担任，常务委员 15 人。校长一职由陈少英担任，同时聘王弄书为名誉校长。会议也议决以“菩提学院附设菩提学校”名义向教育局正式注册。1946 年 1 月 12 日教育局批准菩提小学的成立，当时在何慈灯的协助下，租仰光园为校舍，教授佛学、华文、中国历史、地理、算数、自然科学及英文等科目。除了马来亚学生，亦有十多位来自泰国的华侨和缅甸的两姐弟（也是华侨），这些海外学生皆寄宿于菩提学院内。

由于大多学生来自贫苦家庭，菩提学校免除了 1/3 学生的学费，这造成学校面对经费困难。校方通过各种管道筹募基金，包括了由董事会发起的沿户募捐，以及槟城平社举办义演等。李慈善董事也慷慨预付购置校具和桌椅的费用。最终槟城各佛教寺院住持开始了解办教育之重要性，发起组织槟城佛教徒维护菩提学校委员会，出资出力，共同维护菩提学校的成长。¹值得欣慰的是英国殖民政府于 1947 年颁予菩提小学甲等津贴。

1946 年 6 月 12 日，王弄书居士再次回到槟城，²除协助校务的推行，同时也兼任名誉校长以及教学，并积极协助筹建菩提学校。

1947 年，胡文虎因赴仰光视乃弟文豹先生之丧，道经槟城，再次与院方谈起建校的事情。有感于大家虔

¹ 陈英：《槟成菩提学院成立四十五周年报告》，槟城：菩提学院，1980，第 5-6 页。

² 这应了慈航法师所说的：“王弘法（即王弄书）在仰光热心推动佛教教育，以后菩提学院能扩建，要快快请她回来。”

心为教育付出的精神，胡文虎答应独资捐建菩提学院。院内竖有一志期 1948 年 7 月 25 日的菩提学院纪念基奠石碑，碑中说明菩提学院乃胡文豹独资捐建，并委其族弟桐皆先生负责监理，同时由中国驻槟城领事李能梗奠基。碑文也说明胡文虎独资 30 万捐建菩提学院，除了为善教育，也为了纪念其弟文豹及其弟媳郑亚兰。

1951 年乃第三届高小毕业之年，为让毕业生可以继续升学，同时秉着“兴学弘教”的理念，既然要兴学又要弘教，必须要建立中学，才能谈的上有弘教的作用，专办小学是决难生起普遍弘教作用的。加上王弄书居士因法舫法师的一句话：“现时菩提学校是办小学，留我是没用的，希望将来扩办中学时，我再来帮忙。”而立志要办中学。¹但因教育法令须另建校舍，暂无法获得官方批准，于是先申办中等职业班。1952 年 1 月开课，²除授普通中学课程外，兼授缝纫绣花图音各科。后来菩提中学便是从这中等职业班发展壮大的。

虽菩提中学在 1954 年才获得教育局的批准，但菩提学院早于 1953 年，便在胡文虎独资下完成了六间中学教室的工程。正式获得批准后，菩提中学所教导之课程依照当时一般华人学校的课程，同时也兼重技能训练。课程的另一特色是学生必须上佛学课，藉使学生于受一般知识外，多注重人格修养的德育，以及慈悲和爱，互助和聚的群育教育。³初期，菩提中学开办了 5 班初中，所有中等职业班的学生均转入初中续学。首任校长为王弄书，她几乎将全副精神都花在中学里。

¹ 广余法师：《诸山大德代表致词》，《纪念王弄书居士辞世周年特刊》，特刊编者主编，槟城：菩提学院，1965，第 27 页。

² 陈少英：《往事回忆》，《纪念王弄书居士辞世周年特刊》，特刊编者主编，槟城：菩提学院，1965，第 58 页。

³ 竺摩法师：《荡执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第 236 页。

所幸自开办以来，菩提学校学生在各个方面的表现皆非常出众，除了在全槟华小联合运动会中有优越的表现，更令人兴奋的是，第一次代表菩提中学参加全马初中会考的7位学生，在当时全马只有数十位学生获得及格的考试中全部及格。而且张翠莉更是全科优等，成绩冠全马。这不但惊动了槟城教育界，更加强了董事会和校方办校的信心。菩提中学的学生也热心参与佛教活动，他们曾在槟城卫塞节庆典中参与演出。

王弄书居士认为佛教创办学校，要能在社会上发生强有力的作用，最好是有僧伽在校内讲学，作为师生的师表，使社会人士对僧伽有深刻良好的印象，对三宝能生起虔诚的敬仰。¹因此，在1954年5月4日，菩提学院从香港恭请了当时已届42岁的竺摩法师莅院为导师，²兼于菩提中学教授佛学课。自竺摩法师到槟城后，便开始为大马佛教开拓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无论在组织、度僧、创寺、艺术或是讲经著书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建树。

为了应付迅速的发展以及增设高中部，适逢1955年8月全马各地的佛教代表们云集槟城，讨论成立马来亚佛教会的事宜，王弄书乘机邀请他们到菩提学校参观，

¹ 达道法师：《怀念王弄书居士》，《纪念王弄书居士辞世周年特刊》，特刊编者主编，槟城：菩提学院，1965，第40页。

² 在组织上，竺摩法师除了创建在马来西亚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三慧讲堂，后又与金明法师及金星法师共创马来亚佛教总会，并出任主席长达12年。作为太虚大师的学生，竺摩法师同样强调“提倡佛教教育，培养弘法人材”、“提倡僧伽教育，培养弘法僧材”的重要，故设立马来西亚佛学院，并一直担任院长之职至圆寂为止。总的而言，法师开启新一代青年学佛风气，在马来西亚汉传佛教发展上，达成承先启后的关键任务。马来西亚佛教界在法师的领导、带动及开拓下，开出了新的局面。因此马来西亚佛教界称誉法师为“大马汉文系佛教之父”。有关竺摩法师的一生，可参阅竺摩法师编述，继程整理：《（学年）简谱初稿》，《大马佛教研究第一集》，槟城：马佛青总会佛教文摘社，1984。

并吁请给予支助，广余法师也呼吁大家响应。最终与会者当场决定，共同发动购买学院对面之地段（7万6千5百方尺）献予菩提学院，¹以扩建菩提中学，包括建一座礼堂、科学室、图书馆和教室。旋由董事部连裕祥、王景成、苏承球、庄汉良、陈文炳、李月樵、许镜亮、骆清泉、陈火炎、陈君玉、叶苔痕、骆葆亨、钟文贤、蔡锡洪、许来有等发动筹募建校基金。后来为了将中学建在小学的右侧（即今天之地点），董事部派人与右邻之地主卢佛样商量对换地皮，蒙卢先生的同意，才有今天的校址。²

为筹菩提学中学的建校基金，院方尤其是王弄书、陈心平、广余法师、竺摩法师、本道法师及何慈信等常赴新马各地筹募基金。王弄书更于1957年远赴香港拜访胡文虎夫人陈金枝，谈及菩提中学的筹建计划，承慷慨捐出7万元为建礼堂之经费，以纪念胡文虎。为募捐，王弄书也踏足台湾。因此菩提中学之所以能于1959年竣工，新型校舍，巍然矗立，蔚为全槟城规模完具的华文中学之一来自广大的群众。以至于1960年开学时，能够容纳已增至700多名的学生人数。

菩提小学于1958年接受政府全津，校名改善提国民型小学。虽然接受政府的全津，但菩提小学仍将佛学课列为正课。目前全马来西亚只有两间小学将佛学课列为正课，即菩提小学与马六甲之香林小学。³

¹ 广余法师：《诸山大德代表致词》，《纪念王弄书居士辞世周年特刊》，特刊编者主编，不槟城：菩提学院，1965，第37页。

² 菩提中学于1962年接受政府全津，校名改为菩提国民型中学。

³ 吴德福：《爱教心，护法行——建设大马佛教》，槟城：马佛青佛教文摘社，2007，第261页。除了槟城，马六甲的金明法师却又不同的因缘而发愿创立世俗学校。目睹在天主教会学校受教育的所谓佛教子弟改变了信仰，成为天主教徒，而决定开办学校。当时，由于缺乏经验，金明法师的建议并不获得佛教内的长老大德们的认同，他们也认为出家人不应该办世俗学校。但是，金明法师秉着“自古成功在尝试”的精神，在1951年创办了香林小学。金明法师本也打算开办中学，以让毕业自香林小学的学生有

这些投身教育的工作，直接和简真的改善了社会对佛教的看法。同时，这些学校一般以普通世俗课程为主，自然也免不了灌输佛教教义，通过这样的世俗和佛教教育的结合，也多少改变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马来亚华人社会普遍上佛道不分，佛教徒对佛法没有正信了解的情况。

结论

教育乃培育人才之最重要方式，而佛教界对于世俗教育的工作，确实为社会贡献极大，同时也对佛教的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重要性。我们将从社会文化贡献、社会的改观、弘扬佛教和中文与汉传佛教的前程四个方面，探讨佛教界从事的世俗教育如何贡献于社会，以作为结论。

（一）、 社会文化贡献

社会经济不稳定限制了教育的普及化，进而影响社会的进步。教育对一个社会民族的未来极为重要，教育的缺失，将使一个社会民族朝向衰败之路。

教育是系统性传授知识和培育身心发展等的社会活动，而学校则是为师生提供学习环境的机构，通过特定的方式增进学生的知识和价值观。因此正规教育的根本

升学的管道，但却由于教育制度的因素而无法如愿。虽然如此，对因缘有深刻体会的金明法师，转而向“下”扩展，在 1961 年创办了香林幼稚园，为学前儿童提供启蒙教育，发挥个己力量的极致。

价值，就是通过学校扮演引导作用，为社会培育德智兼备，身心发展平衡的青年。

巴素描述当时的华人：

通常穿的是一条短袴，在腰部扎了一条带子及足穿草鞋，但也时常赤足。¹

如此的生活环境，上学绝对是一种奢侈。佛教界创办义学，进而发展中小学，必能弥补失学青年求学的心愿，满足华人社会对教育的渴望。移民的生活相对富足后，也开始重视后代的教育机会。因此，华人所到之处，往往都办学兴教，让子女们有机会受教育。20 世纪初开始有新式学堂，但 1931 年时，只有 31.2% 的华人有机会接受新式教育，到了 1941 年，这个数字提升到了 62.2%。²

华文教育在马来西亚的发展，始终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不论是在英国殖民时期、日战期间，甚至是独立后的今天，都面对着种种的困境。无论是政府政策的限制，还是民族主义的制约，都让华文教育的发展进程受到打击。但马来西亚华人不顾一切，把华文教育当做民族的根，坚决捍卫。而佛教界，尤其是汉传佛教就是在这样环境下，加入发展华文教育的行列，借助佛教的慈悲精神，为华文教育和中华文化的传承，献出绵力。

教育也深深的影响着中华文化，唯有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下，华人子弟才能对本民族的风俗、传统、文化等有深刻的认知；唯有掌握华文，才能对文化有深入的理解和体会。因此，佛教界所创设的正规与非正规学校，

¹ 维多巴素著、张奕善译：《近代马来亚华人》，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第 43 页。

² 李宝钻：《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之研究（1957-2003）》，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第 40 页。

符合了传承文化的需求。而且，这些学校不单以传承中华文化为使命，更对中华宗教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有积极的贡献。借助佛教文化，加深学子对道德伦理的学习与运用，对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有其正面的意义。

总而言之，佛教界参与华文教育的发展，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时代契机。殖民政府关注的是官方英文教育，华人社会的教育发展，就得靠华人社会组织民间群众的力量，将教育普及化，惠及社会失学孩童。这无疑将为社会解决殖民政府难能顾及的教育问题。因此来自佛教的教育资源，就显得迫切需要，以补充现有制度所造成的教育不足。社会经济的不稳定，更需要教育的雄厚基础来调和贫富差距和实现道德文明的建设。

（二）、社会的改观

在佛教长久的流传过程中，难免出现流弊，失去其真正的内涵，故呈献为一种繁琐的形式，或庸俗化的信仰仪式。一直以来，社会一般人士，尤其是华人，对于宗教信仰都不太认真看待，也无足够的宗教知识。多数人盲从或抱持着功利主义心态信仰宗教。在没有真正理解佛教真实义的情况下，有者甚至对佛教产生排斥心理，笼统的将所有宗教现象混为一谈，认为佛教就是迷信。这是由于缺乏基本宗教知识，而无法理智分析所带来的后果，需要提升群众的宗教知识，才能改变这一状况。要去除这些非正信的宗教色彩，提升社会的理性信仰，向社会灌输理性的佛教实义，除了文化事业和出版工作，教育工作亦是重要的一环，也是最为有效和直接的方式之一。因此，佛教界从义学开始，发展到创立小学和中学，就有这样的目的。尤其是独立初期，一切仍在起步阶段，“文化佛教”与“庶民佛教”并存，通过教育事

业提升“文化佛教”的地位，改变“庶民佛教”的庸俗化现象，有其实实在在的意义。

宗教社会学研究证实，宗教在社会中的地位及其继续发展的生命力，有赖于其在社会中所发挥的功能及其文化传播手段。¹惟有真正关怀占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的各种世俗的、日常的生活，并为其提供精神上的归宿和依托，对其形成有效的关怀，宗教才有可能得到最广泛的接受与认同。由此可见，利益社会的教育工作，是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略的，在当时也是刻不容缓的。

佛教界所创设的义学和学校，确实利益了民众，尤其是家庭经济困苦的儿童，让他们获得教育机会，同时也为社会造就人才。他们积极的从教育事业着手，为社会谋求福利，使教育得以普及，让佛法得以传播，对佛教的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菩提小学、中学及校友会，在某年的卫塞节前后两晚，在学校大草场表演佛剧及歌舞助庆，恭请僧俗各界到场参观。菩提小学校长陈英，更编写了释迦牟尼佛成道儿童歌剧剧本，由儿童演出。让观众通过观赏演出，了解佛陀从出生、出家修行、成道、度化众生到涅槃的整个过程。²同时小学生也演出系列歌曲，如牧牛女歌、牧童歌等。如此的庆祝方式，不单只为热闹，更为教育大众而庆祝这三期同一庆的殊胜神圣节日。借用教育机构，趁欢庆节日时，发挥社会教育作用，让民众认识佛教教义，而改变他们过去对佛教的错误理解，实为有效。

¹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百年文化冲撞与交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第292页。

² 作者不详：《佛教简报》，《无尽灯》第6卷第3期，槟城：马来亚佛教会，1957年5月30日，第29页。

妇女们也关心马来亚教育的发展，积极的筹办菩提学校，为马来亚华文教育和佛教写下光辉的一页，甚至连竺摩法师也极赞叹这些妇女对教育和佛教所做出的贡献，称誉他们“笑看巾帼，压倒须眉”。¹妇女们积极的参与到教育的发展工作中，在当时的社会环境确实不易，但是却又最能让社会大众所注意。因而，他们为教育事业的付出，也最能直接的让社会群众对佛教改观。

这些投身教育的工作，直接和简直的改善了社会对佛教的看法。同时，佛教界办的学校自然也免不了开设佛学科，通过世俗教育和佛教教育的结合，也多少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马来亚华人社会普遍上佛道不分，佛教徒对佛法没有正信了解的情况。

（三）、 弘扬佛教

该如何借助教育发扬释迦牟尼的慈悲精神，洗净佛教界内在的种种“庸俗”情况和妨碍社会发展的污点，使佛教为社会服务，佛教才有前途，否则，只能被淘汰。如何利用教育工作，用心培养下一代和开拓佛教未来，是当时僧俗二众给予考虑的。

佛教通过教育事业关怀社会，是“建立佛教徒新形象”的有效管道之一。太虚大师指出：

佛教徒“非惟应尽觉人的任务，并须做些社会上实利的事业才好。如基督教的致力种种公益事业，寓实行利他主义于宣教中，体用兼施，其用意深足取法。”²

¹ 竺摩法师：《荡执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第238页。

² 太虚大师：《太虚法师讲佛学记》，《海潮音文库·社会学》，北京：线装书局，2005，第85页。

借助世俗学校教育，教导世俗知识的同时亦灌输佛教思想，可能比在寺院开设正规佛学教育来得有效。而且世间知识也是“为人”之道，故能与佛法相通。因此创办世俗学校，除了可达到一般教育作用，也能让社会对佛教的改观，因此也是弘扬佛法的极佳管道。王弄书就认为佛教办教育就是为了完成“兴学弘教”的理想，而且要能在社会上发生强而有力的作用，最好是有僧伽在校内讲学，作为师生的表率，使社会对僧伽有深刻良好的印象，对三宝能生起虔诚的敬仰。¹

同时，发展一个宗教，如果要收到良好的成效，必须从栽培人才着手；有了人才，才有成功的希望；否则做起事来，捉襟见肘，事事难通。而培养人才，教育是关键的手段。教育家沈慕羽有同样的看法，在第二届马来亚佛教会会员大会演说时，他就认为：

如何去灌输群众以佛教真理，使大家对佛教有正确的认识？其中有两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的：第一、是应要多办学校。好像这里马六甲的香林学校，槟城的菩提学校，星洲的菩提学校与弥陀学校；办了这些学校，不但能够救济文盲，使大家有书读，而且能使一般人对佛教有正确的观念，这些青年人，既对佛教有了正确的观念，受了佛化的薰陶，自然而然会养成好品格，他们长大后，成为国家的好公民，也就是佛教的正信教徒了；这样一来，就能够把佛法推广出去；我认为

¹ 达道法师：《怀念王弄书老居士》，《纪念王弄书居士辞世周年特刊》，槟城：菩提学院，1965，第40页。

这是顶重要的一件事。第二、佛教会应普遍成立。……¹

如果华文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对佛教的拓展也有着直接的影响。受华文教育者自然愿意接触汉传佛教，看得懂汉语佛教经典。另外，汉传佛教毕竟和华人习俗更接近，更符合民族心理，华人从宗教实用性考虑往往也会选择汉传佛教。²

通过创办学校，一方面以个人人格影响他人，一方面合力净化社会，达成建设人间净土的目标。而建立人间净土，就是弘扬佛法的最终目的。所以说，佛教界从事教育工作，确实也有弘扬佛法的效用，且也获得一定的成果。

佛教教育事业是服务于社会的一种慈悲行动，也是传播佛教、践行佛法、引导正信、树立佛教形象等最有效的方式之一。

（四）、中文与汉传佛教的前程

教育程度的提高，表示着文化建设也将得到相应的提高，这对于一个宗教的发展有着积极的影响。教育一直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要一环，而语言教育更是认识和了解文化精髓的重中之重。通过语言，佛教徒才能有效和深入的了解佛教义理，而在马来西亚，许多佛教徒就是通过本身的母语或英语学习佛法的。但是马来西亚的教育一直被几个黑箱内的问题所困扰，其中包括国家的教育应该是单语教育（国语——马来语），还是多语教

¹ 作者不详：《沈慕羽先生演说》，《无尽灯》第 10/11 期，槟城：马来西亚佛教会，1951，第 7 页。

² 白玉国：《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第 163 页。

育？是不是只有单语教育才能团结、认同及效忠国家？

1

一连串的教育报告书和法令的发布，让母语教育面对越来越苛刻和严厉的条件。官方的教育政策一直有一个最终目标，即最终只有单语教育，这一直都是母语教育挥不去的阴霾。

从汉传佛教的角度而言，失去了学习母语的机会，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就失去了有效“深入经藏”的重要因缘？这对佛教的发展将是一个怎样的前景？这都是值得关注的课题。如今马来西亚的华文程度虽不低，但一般民众仍无法读懂古文佛经，如母语教育受到打击，华人对佛经的理解必将受到严重的影响，进而佛教的传播必也将受到负面影响！

幸而过去大德的努力，至少为华文教育的发展贡献出宝贵的精力，如今也获得了一定的成果。至少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大环境中，还有菩提中小学、菩提独中、香林小学等有佛教界创设的学校，仍努力的传播华文教育，也通过正规教育教导佛学，这对汉传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虽微不足道，但仍可看出僧俗们的努力，对汉传佛教的未来，有着些许的影响。

总而言之，华僧和在家居士，由于家乡的困苦条件，不得不“渡南洋”。到了马来亚后，佛教界发挥着佛陀的慈悲精神，一方面通过教育协助清寒子弟，另一方面，借助教育机构和方式度“化众生”。

¹ 郑良树：《独立后华文教育》，《馬來西亞華人史新編（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第255页。

参考书目

- 《槟城新报》，1913年4月29日。
- 白玉国，《马来西亚华人佛教信仰研究》，厦门：厦门大学南洋研究所博士论文，2006年。
- 陈剑虹，《槟榔屿广福宫庆祝建庙188周年暨观音菩萨出游纪念特刊》，槟城：广福宫信理部，1989年。
- 陈秋平，《慈悲为怀扶贫弱·兴学弘教传薪火——马来西亚菩提中学创办人王弄书》，《中教学报》，新加坡：中学华文教师会，2014年8月，第39期。
- 陈少英，《马来亚佛教会设立星期日幼稚义学园概况》，《无尽灯》第39期，槟城：马来西亚佛教总会，1968年。
- 陈英，《槟成菩提学院成立四十五周年报告》，槟城：菩提学院，1980年。
- 陈支平，《福建宗教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
- 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百年文化冲撞与交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 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佛光大藏经——禅藏·语录部——虚云和尚年谱》，高雄：佛光出版社，1994年。
- 继程法师，《印顺导师与马来西亚佛教》，《马来西亚佛教青年总会25周年特刊》，槟城：马佛青总会，1995年。
- 开谛，《南游云水情：佛教大德弘化星马记事（附录篇）》上册，槟城：宝誉堂教育推广中心出版，2017年。
- 李宝钻，《马来（西）亚华文独立中学教育之研究（1957-2003）》，台北：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05年。

骆静山，《槟城佛教义学简介》，《无尽灯》第43期，槟城：马来西亚佛教总会，1969年。

释宝慈，《极乐寺志》，槟城：极乐寺，1923年。

太虚大师，《太虚法师讲佛学记》，《海潮音文库·社会学》，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

特刊编者主编，《纪念王弄书居士辞世周年特刊》，槟城：菩提学院，1965年。

王云五，《中外条约汇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

维多巴素著、张奕善译，《近代马来亚华人》，台北：商务印书馆，1972年。

吴德福，《爱教心，护法行——建设大马佛教》，槟城：马佛青佛教文摘社，2007年。

吴剑雄，《海外移民与华人社会》，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许源泰，《沿革与模式：新加坡道教和佛教传播研究》，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八方文化创作室，2013年。

杨建成，《华侨史》，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十六集，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1985年。

于凌波，《中国近现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

张奕善，《东南亚史研究论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4年。

郑良树，《独立后华文教育》，《马来西亚华人史新编（二）》，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1998年。

竺摩法师，《荡执成智·真空妙有——五十年来的槟城佛教》，《光华日报金禧纪念增刊》，槟城：光华日报，1960年。

竺摩法师编述，继程整理，《（学年）简谱初稿》，《大马佛教研究第一集》，槟城：马佛青总会佛教文摘社，1984年。

《汉学研究学刊》第十二卷(2021)
Journal of Sinological Studies, Vol.12 (2021)

作者不详,《佛教简报》,《无尽灯》第 6 卷第 3 期,檳城:马来亚佛教会,1957 年 5 月 30 日。

作者不详,《沈慕羽先生演说》,《无尽灯》第 10/11 期,檳城:马来亚佛教会,1951 年。

Wong Choon-San (1963). *"Kek Lok Si": Temple of Paradise.*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Ltd.

Crossing the Nanyang (South Seas) and Serving the Sentient Beings: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 Education with the coming of Buddhist Monks and Laity

TANG Chew Peng
General Studies Center, Southern University College

Abstract

Chinese Buddhism, as the most vital part of Malaysian Buddhism, during the its expansion in Malaysia, has actively involv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 education with great implications. After the arrival of Buddhist monks and lay people in Nanyang, they star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free schools, and then opened kindergartens, Phor Tay Primary School, and Phor Tay High school. In addition to giving the Chinese community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they also had a good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Dharma. Whether it is for secular educational purposes or to promote the Dharma, its main purpose is to promote the Buddhist spirit of compassion.

The long-term involvement in secular education has made Buddhism extremely effective in reaching out the masses. In term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education has reconciled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d managed to build moral values among the masses. Because of its contribution to secular education, it has enhanced the image of Buddhism. Coupled with the joint effort with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Buddhism, it has changed the landscape of Malayan Chinese society which generally is unable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Buddhism and Taoism, and is thus exposed to learning more orthodox Buddhism. It also involves in promoting Chinese education to ensure the

continuation of Han Buddhism and all these efforts have produced desired results.

Keywords

Han Buddhism, Secular Education, free education (Yixue), Phor
Tay School, Crossing the Nanyang